

杜甫研究三十年

——以《杜甫研究学刊》为中心的讨论（三）

吴中胜

六、杜甫批评史、接受史研究

我们认为，杜甫批评史、接受史可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杜甫批评、接受前人，二是后人批评、接受杜甫。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他非常擅于吸收前人创造的精神文化和艺术成果，这是前一个层面批评史成立的理由。而后一个层面呢？由于杜甫诗艺和人格魅力的巨大影响，历代学杜、评杜、注杜、解杜、笺杜者多矣，几乎到了言诗必言杜的地步，杜诗成了各家阐述自己的诗学见解、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的最佳话语和最好平台。这样，客观上形成了杜甫批评的历史、杜诗接受的历史。这个历史本身就值得我们再研究。冯至说“杜诗能够变吗？当然不会变。但由于它的内容太丰富了，读者不能一览无余，这次看到这方面，那次看到那一方面，所以使人感到‘含变态’，但杜诗本身还保持它的‘万古春’。此外，时代在变，读者的思想也在变，对于杜甫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杜甫在他生前和他

死后的一段时期内，是不被人重视的，甚至受人毁谤，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韩愈的《调张籍》都可以证明；现在流传下来的唐人选唐诗，几乎没有一种选本选择了杜甫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两宋诗人大多对杜甫推崇备至，元明以后，对杜甫又有毁有誉，各有不同的评价。”^①这段话就已涵含有杜甫批评史的因子。三十年来，学者非常重视杜甫批评史、接受史的研究，已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著出现，如许总《杜诗学发微》（1989年）、廖仲安《杜诗学》（1994年）、胡可先《杜诗学论纲》（1995年）、杨义《李杜诗学》（2001年）、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2003年）、吴怀东《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2004年）、孙微《清代杜诗学史》（2004年）等。《杜甫研究学刊》多年来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动向。如胡可先《杜诗史料学论纲》就发表在1997年第2期上，其他专著也陆续有文章或书评提及。这是整体研究的

作者：吴中胜，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341000。

状况，就各个时代的具体问题，《杜甫研究学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我们下面分时代来看看这方面的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关于杜甫对前人的接受与批评的研究。张志岳《略论杜甫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继承与发展》（1982年第1期）、陶道恕《何刘沈谢力未工 才兼鲍照愁绝倒——略论鲍照诗对杜甫的影响》（1982年第1期）等文章关注是杜甫与六朝诗歌的关系，而吴怀东博士的专著则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杜甫研究专家张忠纲为之作序（2002年第2期），称本书“颇多创获”。杜甫是非常重视学习前人的，他的思想和艺术与前代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顺着这条思路，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工作。近些年，有不少学者以《杜甫与汉代文化》、《杜甫与先秦文化》等为题作硕、博士论文，相信在这方面会有更多成果出现。丁启阵《杜甫的汉朝情结》（2005年第1期）、赵海菱《杜甫与两汉审美风尚》（2005年第2期），就是这一学术理路的大胆摸索。

杜甫在唐代的接受与批评是学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创刊号发表的曾枣庄《论唐人对杜诗的态度》，文章观点主要有三：1、在唐代已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杜诗的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杜诗的价值并未被多数唐人认识；3、杜诗普遍受到重视是在宋代。而房日晰《论韩愈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1989年第4期）、谷曙光《艺术津梁与终极目标——论韩愈作为宋人学杜的艺术中介作用》（2005年第1期）、房锐《杜甫对晚唐五代文人的影响》（2006年第1期）几篇文章也从具体的角度出发，认为杜甫在唐代是受到重视的。而主张杜甫在唐代不受欢迎的学者的重要依据就是

《河岳英灵集》等唐诗选本多不选杜诗，有关讨论很热烈。蒋凡《〈河岳英灵集〉与杜甫》（1983年第1期）认为《英灵集》不选杜诗，是客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与殷璠的选诗标准无关。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1994年第1期）则从选诗标准解释为什么殷璠不选杜诗。杨经华《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诗在唐、五代接受情况统计分析》（2004年第3期）则用数理统计学的方法作了分析，其科学方法值得我们重视。

杜甫在宋代得到高度重视，相应地，新时期这方面的文章也非常之多。有的从整体立论，如曾枣庄《天下几人学杜甫 谁得其皮与其骨——论宋人对杜诗的态度》（1982年第1期）、杨胜宽《宋代蜀人论杜》（1995年第1期）、杨胜宽《南宋杜学片论》（1995年第3期）、胡可先《论宋末的杜诗学》（1998年第1期）、杨胜宽《说宋人读杜诗》（2004年第3期）等，认为杜甫其人其诗在宋代受到特别的关注，受不同时期政治局势和士人心理的影响，又呈现出不同的阅读方式和关注重点。有的评具体作家、理论家或诗话著作对杜甫的接受与批评，如创刊号上发表杨铭庆的《南宋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评介》，则是对历史上的重要的杜诗刻评本的评议，这也是杜甫批评史的重要内容。刘开扬《梅圣俞与杜甫》（1990年第2期）、李凯《江西诗风盛行下的杜甫观——〈韵语阳秋〉论杜评述》（1997年第1期）、杨胜宽《张戒论诗：尚意与崇杜》（1998年第1期）、沙先一《试论朱熹对杜甫夔州诗的评价》（1998年第3期）、刘振娅《〈容斋诗话〉谈杜诗命意与技巧》（2000年第4期）、刘一

良《且为沈括论杜诗一辩》(2003年第3期)、刘文刚《鲁岑的杜甫研究》(2005年第2期)、武国权《论赵次公杜诗解释重视艺术性的特点》(2006年第4期)、潘殊闲《叶梦得与杜甫》(2008年第1期)、杨许波《苏舜钦诗歌学杜考述》(2008年第2期)等就是对具体问题的研讨,但对宋代杜诗批评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几个重要作家、理论家身上,如讨论苏轼的就有张志烈《简牍仪刑在——谈苏轼的评杜与学杜》(1981年第2期)、王文龙《说东坡论杜》(1994年第2期)、杨胜宽《苏轼论杜甫韩愈平议》(2008年第2期)、杨经华《“伪苏注”何以托名苏轼》(2008年第3期)等4篇,讨论王安石的有高克勤《愿起公死从之游——论王安石在杜诗学上的地位》(1990年第2期)、赵晓兰《王安石与杜甫》(1991年第4期)、吴中胜、孙雨广《东京之子美——论王安石学杜》(2002年第4期)3篇,讨论黄庭坚的有杨胜宽《从苏黄论杜看宋诗风格的变化——兼论中国古代诗界的宗派门庭》(1992年第4期)、莫道才《黄庭坚论杜甫》(1997年第2期)、黄镇林《语不惊人死不休——略论黄庭坚学杜》(2000年第4期)、陈耀东《黄庭坚论杜甫与寒山子——兼述杜诗中的佛学禅宗意蕴》(2003年第2期)、陈善巧《“诗义”与“诗义”的并进——论黄庭坚在蜀中时期对杜甫的推崇》(2008年第2期)5篇,讨论陈与义的有白敦仁《论陈简斋学杜》(1993年第3期)、吴中胜《“诗宗已上少陵坛”吗——再评陈与义学杜》(1996年第1期)2篇,讨论陆游的有许世荣《放翁未必学杜》(2000年第4期)、徐丹丽《论“放翁前身少陵老”的真正内涵》(2005年第1期)、杨理论

《陆游与杜甫——一个诗学阐释的视角》(2007年第4期)3篇,讨论文天祥的有莫砺锋《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1992年第3期)、黄镇林《善陈时事 同声相应——从文天祥〈集杜诗〉看杜诗对后世的影响》(1999年第1期)、屈守元《文天祥与杜甫》(2000年第4期)、吴中胜、李三梅《诗歌若杜甫——论文天祥学杜》(2000年第4期)4篇,讨论刘辰翁的有张静《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2004年第1期)、焦印亭《刘辰翁批点杜甫诗论略》(2008年第1期)2篇。说明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陆游、文天祥、刘辰翁这些作家、理论家在评杜学杜方面比较突出,所以引起学者的持续关注,而这些持续关注也利于问题的研讨,有不少同一研究对象的文章观点针锋相对、两相辩驳,这利于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但我们要看到,作为一个评杜学杜的高峰,宋代评杜学杜远不止这些人和著作,我们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拓展视野。

在以前学人的视野中,金元时期是杜诗学相对低落时期,但新时期的相关研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文章主要有詹杭伦、沈时蓉《元好问的杜诗学》(1990年第4期)、曾亚兰《元代学杜女诗人郑允端》(1994年第3期)、曾亚兰《从元人学杜咏杜看元人模杜之风》(1995年第2期)、詹杭伦《方回杜诗学综论》(1987年第1期)、张浩逊《王冕和杜甫》(2003年第2期)、吴河清《唐诗之冠冕 万古之准则——方回眼中的杜甫诗歌》(2006年第2期)等,主要研讨元好问、方回等少数几个人。赵海菱《杜诗在元代的研究与整理》(2008年第2期)对元代的相关情况作了全面梳理,值得我们关

注。本文认为，元人尚儒学，所以杜甫备受元人尊崇，元人重诗法，出神入化的杜诗律法被奉为做诗的楷模和圭臬。元代有若干部杜诗编注本流传至今。总之，杜诗在元代的研究与整理是杜诗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学人的杜诗学观念。

明代一般也认为是杜诗学相对薄弱的时期，但实际上，明代人对杜诗学也提出了自己的时代命题，这些命题有待我们深入探讨。新时期的相关文章有王仲镛《杨慎杜诗学述评》（1982年第1期）、周子瑜《从〈升庵诗话〉看杨慎研究“杜学”的方法以及他提出的一些观点》（1991年第1期）、管遗瑞《评〈诗原辨体〉对杜诗的研究》（2000年第4期）、周兴陆《从杜诗接受史考察黄生的〈杜诗说〉》（2001年第4期）、魏青《宋濂的〈杜诗举偶〉序》（2002年第4期）、周济夫《海南人写的杜诗评论——略谈钟芳〈重刻杜诗序〉》（2006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就关注到一些具体问题。而刘开扬《明人研杜撷英》（1993年第1期）、吴中胜、蒋翠丽《明代诗人论杜甫》（2008年第3期）两文则有总论性质。刘开扬认为，明代研究者以杨慎、王世贞、胡应麟、胡震亨、王嗣奭等著称，此外，明初之瞿佑、成化、弘治年间之李东阳，嘉靖间之谢榛均有所见。刘文摘录瞿佑《归田诗话》、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和谢榛《四溟诗话》三部诗话中论杜之语而加以评鹭。吴中胜、蒋翠丽则认为，杜甫的社稷之心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明代诗人，他们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认识也并非浅薄。

清代是杜诗学的又一个高峰，如前所说，已有孙微的杜诗学断代史专著出版，

相关文章也非常之多，如陈昌渠《谈〈奉赠韦左丞丈〉兼论王夫之对杜甫的批评》（1982年第2期）、赵维融《清人论杜资料辑录》（1985年第2期）、熊志廷《王船山评杜浅议》（1986年第2期）、许结《方东树论杜述评》（1987年第2期）、周锡山《金批杜诗思想论——论金批杜诗》之一、之二、之三（1988年第3期、1989年第2期、1992年第3期）、罗焕章《“少陵疑是我前身”——谈李调元的杜诗学》（1991年第1期）、熊良智《王夫之论杜评说》（1991年第3期）、刘明华《芬芳悱恻解杜 转益多师学杜——袁枚对杜诗学的贡献》（1993年第1期）、管遗瑞《通俗的评说 精深的研究——评清人徐增〈说唐诗〉对杜诗的鉴赏》（1993年第1期）、罗焕章《李调元是怎样学杜诗的》（1993年第2期）、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1994年第1期）、曾亚兰《清代女子学杜絮语》（1994年第1期）、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1995年第3、4期）、屈守元《顾炎武和杜甫》（1996年第3期）、赵晓兰《四库馆臣与杜诗学》（1996年第4期）、孙琴安《清代诗歌评点的热点之一：杜诗》（1999年第2期）、曾亚兰、赵季《说仇兆鳌以楚辞注杜诗》（1999年第2期）、曾亚兰、赵季《说仇兆鳌以诗经注杜诗》（1999年第4期）、朱学东《王夫之〈姜斋诗话〉对杜诗的批评》（2001年第2期）、鄂国平《顾炎武与杜甫诗注》（2002年第3期）、詹杭伦《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2002年第3期）、李凯《清人注杜的诠释学观念》（2002年第3期）、周兴陆《吴瞻泰〈杜诗提要〉研究》（2003年第1期）、孙微《〈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杜诗学》

(2003年第1期)、沈时蓉《张元〈读杜诗十六绝句〉探析》(2003年第1期)、张月霞《浅论杜甫对蒲松龄诗歌的影响》(2003年第2期)、周兴陆《鲁一同〈通甫评杜〉琐谈》(2003年第3期)、吴中胜《清代论杜绝句》(2004年第2期)、孙微《〈全唐诗〉底本所体现的杜诗学》(2004年第3期)、赖玉芹《论清初诗人的杜诗情节》(2004年第4期)、杨旭辉《清代常州诗群与尚杜风潮——兼论杨伦〈杜诗镜铨〉及其诗歌影响》(2004年第4期)、陈水云、王茁《叶燮论杜诗》(2004年第4期)、邓新跃《杨慎对杜诗“诗史说”的批判及其批评史意义》(2005年第1期)、周生杰《诗是吾家事 人传世上情——梁启超论“情圣”杜甫》(2005年第1期)、郝润华、王永环《黄生〈杜诗说〉与清初杜诗诠释方法》(2005年第2期)、徐希平《方东树〈昭昧詹言〉论杜甫述略》(2005年第4期)、吴淑玲《清初杜诗批评的新变》(2005年第4期)、周兴陆《王铎、钱陆灿批点〈杜工部集〉提要》(2006年第4期)、廖宏昌《二冯尊杜诗学的理论意涵》(2006年第4期)、张浩逊《金圣叹“拟杜诗”评说》(2007年第1期)、吴淑玲《建国以来仇兆鳌和〈杜诗详注〉研究述评》(2007年第1期)、吴中胜《以诗证史 以史证诗——评刘凤诰撰〈杜工部诗话〉》(2007年第1期)、赵睿才、张忠纲《一个杜诗孤本的发现——朱琦及其〈杜诗精华〉》(2007年第2期)、刘文刚《潘德舆的杜甫研究》(2007年第3、4期)、蔡锦芳、张运平《蒋金式及其批〈杜工部诗集辑注〉研究》、孙微、王新芳《陈醇儒及其〈书巢杜律注〉》(2008年第1期)、吴淑玲《〈杜诗详注〉集

“义理”、“考据”、“辞章”的批评方法》(2008年第1期)、王学军《〈读杜心解〉与清代八股文》(2008年第2期)、陈道贵《论杜诗学史视野中的清初徽州的杜诗研究》(2008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的研究虽然主要集中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而且关注点主要围绕王夫之、钱谦益、金圣叹、仇兆鳌、方东树等少数人及其著作上,但的确把握住了清代杜诗学的热点问题,如钱(谦益)、朱(鹤龄)之争就是一大热点,这方面有几篇文章参与讨论,如蔡锦芳《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研究》(1990年第1期)、(日)长谷部刚《从“连章组诗”的视点看钱谦益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接受与展开》(1999年第2期)、郝润华《〈钱注杜诗〉中的诗史互证与时代学术精神》(2000年第1期)、郝润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2001年第4期)、綦维《孝子忠臣看异代 少陵诗史汗青垂——试析〈钱注杜诗〉中钱氏隐衷之抒发》(2001年第4期)、杨春俏《李念慈批点〈钱注杜诗〉辑考》(2004年第3期)等就是。清代有几种重要的杜诗注评本,如仇兆鳌注本、杨伦论本、金圣叹批本等,近三十来的有关讨论多有所涉及,把握住了清代杜诗学的主脉。清代杜诗学材料甚多,周兴陆博士的几篇文章比较注重新材料的挖掘。清代杜诗学与当时的学术思潮紧密相关,孙微博士则关注重要的学术事件背后的诗歌理念。这些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清代杜诗学的研究。但是我们应看到,清代杜诗学资料非常丰富,据蒋寅先生《清诗话考》所列清代关于杜诗的专门诗话就有54部,^②其他不以杜诗话命名而其中大量关涉杜诗的就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以“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评清代学术,^③我们

认为，清代杜诗学也同样有这一特点。我们认为，今后的清代杜诗学，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深细方面的挖掘工作，另一方面，也不能老停留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而忽视整体的观照和把握。把深细和整体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总结清代杜诗学的成就。

民国时期也是杜甫诗学研究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动荡的社会使学人自然联想起安史之乱中的杜甫，有异代心通之意；另一方面，新的学术观念的传入，使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有更多的现代化色彩，从而有别于古典诗学的理论型态。主要文章有邓哲《谈鲁迅对杜甫的态度》（1990年第1期）、管遗瑞《评苏雪林在〈唐诗概论〉中对杜诗的研究》（1993年第4期）、陈新璋《评胡适的杜诗观》（1995年第1期）、廖仲安《记抗战时期三位热爱杜诗的现代作家和学者》（1997年第1期）、邓达泉《漫说杜诗对鲁迅旧体诗的影响》（1998年第1期）、张浩逊《闻一多和杜甫》（2001年第3期）、张迎胜《冯至先生的杜甫研究》（2001年第3期）、赵敬立《风调异代有同声——鲁迅与杜甫浅论》（2003年第4期）、李凤玲、赵睿才《治杜的态度：了解之同情——闻一多先生的杜甫研究（一）、（二）》（2004年第3、4期）、王京州《李审言杜诗研究述评》（2006年第3期）、赵睿才《葦路蓝缕 以启山林——冯至先生的杜甫研究》（2006年第3期）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固然对旧体诗词包括杜诗产生一定的冲击，旧体诗这门高雅艺术从正统地位坠为“谬种”，但它并未消亡，还有不少文化人爱用此形式言志抒情。鲁迅、苏雪林、胡适、闻一多、冯至、老舍、萧涤非等一大批文化名流，或受杜诗的滋养创作

旧体诗，或在大学讲坛大讲杜诗，或撰专著对杜诗阐释发微。受欧风美雨的浸染，杜甫批评研究逐渐摆脱传统范式而走上现代化的进程。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杜甫研究也一时兴盛。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诗解》等通俗性读物先后出版。近三十年来，关于这段时期的杜诗学有几个比较集中的话题。一是毛泽东及其他伟人对杜诗的态度，孙琴安《毛泽东与杜诗》（1990年第3期）、李中耀《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杜诗》（1998年第4期），简单认定毛泽东不喜杜诗，吴直雄《毛泽东对杜甫诗并未妄加抑扬》（1999年第3期）则以大量详实史料证明，毛泽东并未对杜诗妄加抑扬。陶瑞芝《开国元勋喜杜臆说》（1999年第4期）一文认为，朱德、陈毅和叶剑英也喜爱杜诗。二是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和清算。这是特殊时期出现的学术怪胎，这一点学界已无争议。与其他学人简单批判不同，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1998年第4期）一文，把本书放在学术史的长河中与政治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本书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产物。应当说，这个观点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三是对建国初的杜诗学成就的评价。朱光立《萧涤非先生与〈杜诗解〉》（2008年第3期）就是这面的思考。

进入新时期，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学界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欣欣向荣。就杜甫研究而言，成立了杜甫研究学会，有专门的学术期刊《杜甫研究学刊》，定期召开相关学术会议，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杜甫研究。新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杜甫研究专家，出现了一大批扎实的著述。这些情况，《杜甫研究学刊》都给予及时的关

注,先后发表了相关评述性文章,有张忠纲《裴斐与他的杜甫研究》(1999年第1期)、钟来因《钱钟书与杜甫》(1999年第2期)、孙微《后出转新 独树一帜——评韩成武〈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2001年第2期)、张志烈《光辉的楷模——缅怀陈贻焮先生的杜诗研究》(2001年第2期)、张忠纲《道德文章两峥嵘——痛忆贻焮师》(2002年第4期)、王永波《杜诗学研究的新收获——评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2002年第4期)、童强《子美集开诗世界——读莫砺锋〈杜甫评传〉》(2003年第3期)、胡可先《继承与创新——评〈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兼谈世纪之交的杜诗研究》(2003年第3期)、郝润华、伍国权《杜甫诗话的集成性整理——评〈杜甫诗话六种校注〉》(2004年第2期)、王永波《杜诗学的建构与评判——评胡可先〈杜诗学引论〉》(2004年第3期)、杨理论《求新求变论杜诗——读刘明华先生近著〈杜甫研究论集〉》(2005年第1期)、阮堂明《陈寅恪的杜诗观述论》(2005年第2期)、张忠纲《志存少陵壮怀烈——兼论张志烈教授的杜甫研究》(2006年第3期)、张志烈《白敦仁先生的杜诗研究》(2007年第1期)、凌朝栋《龙文虎脊皆君馥 历块过都见尔曹——读莫砺锋教授〈杜甫诗歌讲演录〉》(2008年第2期)等。陈寅恪、钱钟书、裴斐、陈贻焮、白敦仁、莫砺锋、张忠纲、刘明华、胡可先、韩成武、郝润华、吴怀东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得以推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杜甫批评、接受史研究的状况。

总的来看,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上关于杜甫批评史、接受史的文章与杜甫

在历史上的批评、接受的状况是成正比的,宋代、清代和现当代较多,而元、明则相对少些。

七、培养学术队伍,跟进学术信息

《杜甫研究学刊》不仅发挥了老一辈杜学研究专家的热情,对萧涤非、陈寅恪、朱东润、裴斐、钱钟书、陈贻焮、程千帆、莫砺锋、白敦仁、韩成武、张忠纲、朱明伦、刘明华、胡可先等大家的著作,都刊发评论或报到的,而且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杜诗学者,壮大了学术队伍。笔者对《杜甫研究学刊》自创刊以来发表文章(含讲话、致辞,不计诗词创作)的作者作了一个数字统计。统计时间从《草堂》创刊至《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止,以出现在刊物上的先后为序。结果分析如下:

(一) 共计作者634名。

(二) 其中撰文十篇以上者有: 祁和晖27篇, 张志烈26篇, 刘开扬13、金启华13、谭文兴14、钟树梁17、许永璋10、吴明贤14、丁浩12、刘明华17、刘友竹16、张忠纲17、曾亚兰22、詹杭伦15、陶瑞芝19、胡可先18、刘文刚10、蔡锦芳11、李祥林10、房日晰10、管遗瑞12、徐希平10、杨胜宽17、王飞10、韩晓光11。我们把这些列入第一梯队。

(三) 5—9篇的作者有: 屈守元7、王仲镛8、陈昌渠8、濮禾章9、许总5、白敦仁6、钟来因5、常思春5、郑文8、谢宇衡7、林继中7、林弘7、许世荣8、贾兰6、孙琴安6、刘新生7、卢燕平6、刘真伦6、赵晓兰7、石婉祥6、沈时蓉8、邓小军8、(香港) 邝健行9、蒋先伟6、黄玉顺7、莫砺锋6、葛景春5、张天健5、陈冠明7、牟瑞平8、何锡光5、吴中胜7、韩成武9、丁启阵6、聂大受5、

张浩逊 7、周兴陆 8、李宇林 6、郝润华 5、赵睿才 8、孙微 8、许德楠 6、杨渝泉 6、周睿 5。我们把这些列入为第二梯队。

5 篇以下者可列为第三梯队（人数众多，从略）。

用数据来说明社会科学的问题，有时难免不伦不类，它并不能绝对地说明问题，如莫砺锋先生绝对是新时期杜甫研究的大家，虽然他在本刊发表文章不多，但篇篇是精品，所以我们不能完全靠数字来说明问题。有些杜甫研究大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享誉学坛，但到八十年代年事已高，撰写论文不多。有些作者的论文发表在其他刊物，相关数据也有出入。有些研究者，只有专著而少写论文，也会影响我们的统计结果。但数据至少能大体上说明一些现象。如第一梯队的大多是长期从事杜甫研究的专家、名家、大家，这些人的成果长期支撑着《杜甫研究学刊》，也可以反映近三十年来杜甫研究的基本成就，有不少人现在仍然是杜甫研究的顶梁柱。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艺术经验，后来人应好好吸取。但我们也应看到，其中有人已去世，有不少专家年事已高；第二梯队的人员，大多是八、九十年代进入杜甫研究领域，有不少是硕士、博士，有些人的博士论文即是关于杜甫研究，方法新，视野开阔，年青有活力，这批人可以视为杜甫研究的中坚力量。第三梯队，则多为近年来涉足杜甫研究领域的新秀，各方面还需前辈的引导。总的说来，老一辈的学者既能评诗又能作诗，既是诗学家又是诗人，所以对杜诗的理解更为深切；年轻一代多理论建构，多不能作古体诗，对杜诗的理解多一层隔膜。从以上数据可知，三十年来，《杜甫研究学刊》培养和扶持了一大批杜甫研究专家和杜诗爱好者，许多

学者的第一篇文章或学术道路上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是在这块园地上发表。以这个刊物为中心，杜诗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

如今，杜诗学不仅在内地、大陆，就在港台也有相当影响，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相当多研究者。《杜甫研究学刊》不仅关注内地、大陆的杜诗学，也关注港台的杜诗学；不仅关注国内的杜甫研究信息，也时刻关注国外的研究动态。

首先是港台地区的杜学情况。《杜甫研究学刊》多年来发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邝健行的相关论文有 9 篇之多。陈少芳《一九四九年以后香港杜甫研究概况》（1999 年第 2 期）一文说，从一九四四年后，在香港出版的有关杜甫的论文已有八十多篇，著作和选集亦不下于三十多本，成就是多方面的，从选本的编注、有关杜甫资料的整理、杜诗的分析 and 考证、乃至针对个别问题而讨论的论文或著作，研究方法亦以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学刊也发表过台湾学人的相关论文，如〔台湾〕毛一波《杜律浅尝》（1987 年第 2 期）、龚嘉英《诗有三动不可不言》（1993 年第 1 期）、吴仪凤《杜甫咏诸葛武侯诗探微》（1998 年第 3 期）等，对他们的研究状况也有所了解，他们研究杜甫的方法、视角对大陆学者也很有启发。

国外方面，《杜甫研究学刊》多年来发表较多的是日本学者的相关著述，李寅生一个人就有多篇译文发表。日本学人的相关论文有〔日〕松原朗著，许总译《论杜甫成都以后排律的抒情化》（1987 年第 2 期）、〔日〕神田喜郎作，李大川译《杜甫在日本》（1988 年第 4 期）、〔日〕岩城秀夫著，薛新力译《杜诗中为何无海棠之咏——唐宋间审美意识之变迁》（1989 年第 1 期）、〔日〕松原朗著

《试论杜甫〈旅夜书怀〉诗的写作时期》(1994年第4期)、[日]铃木修次著,秦伏男译《岑参与杜甫》(1998年第2期)、杨天庆《关于〈秋兴八首〉英译等值的思考》(1999年第2期)、[日]户崎哲彦著,陆建林译《杜甫与花卿——杜甫〈赠花卿〉、〈戏作花卿歌〉解释商榷》(1999年第3期)、[日]长谷部刚文,李寅生译《简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几个问题——附关于〈钱注杜诗〉和吴若本》(1999年第4期)、[日]兴膳宏文,李寅生译《略论〈岁寒堂诗话〉对杜甫与白居易诗歌的比较评论》(2001年第1期)、[日]安东俊六文,李寅生译《论杜甫的夔州诗》(2001年第4期)、[日]佐藤浩一《杜甫的“义姑”京兆杜氏——以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铭为中心》(2002年第4期)、[日]上田武文,李寅生译《杜甫在东鲁时期与李白的交友与诗作》(2004年第1期)、[日]松原朗著,李寅生译《论杜甫在蜀中前期的望乡意识》(2008年第1期)等。李寅生还撰文介绍杜甫诗歌在日本的研究情况《略论杜甫诗在日本的流传及日本学者杜诗研究主要方法》(2000年第3期)、《曾来余亦诗成癖 昨夜分明梦杜翁——谈谈杜诗对日本汉诗的影响》(2002年第4期),认为杜诗在日本主要以杜诗版本、杜诗研究、杜诗日文译本、杜诗书目、年谱、图像等形式存在。日本学者研究杜诗与中国学者有不同的方法,注重字句诠释、版本考证,探讨杜甫其人的著作具体深入,重纵横比较。手段上,已开始向现代化方面发展,运用计算机统计等。杜诗对日本汉诗有很大影响。

仅次于日本的,要数韩国、朝鲜了。学刊这些年也发表过不少相关文章,如

[韩国]李丙畴,赵晓兰译《杜甫诗对朝鲜文学的影响》(1992年第3期)、[韩国]闵庚三《韩鲜本〈杜诗泽风堂批解〉评介》(1998年第1期)、邝健行《韩国学者李晔光〈芝峰类说〉中解杜诸条举隅析评》(1999年第2期)、左江《韩鲜李植〈杜诗批解〉的产生背景》(1999年第2期)、[韩国]全英兰《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2003年第1期)等。朝鲜文译本《杜诗谚解》已出版,成为杜诗研究的基本工具书,李丙畴著《杜诗谚解批注》和《杜诗研究》已出版。全英兰一文从高丽、朝鲜所刊之杜诗著作和诗话书两方面考察杜诗的影响。

至于在美国的影响,李芳《以杜解杜 以诗为传——评弗劳伦斯·艾斯库〈杜甫:诗人的自传〉》(2007年第2期)认为,美国汉学家弗劳伦斯·艾斯库的《杜甫:诗人的自传》是现代国外一部关于杜甫的传记作品,它以诗为传,以杜解杜,是杜甫传记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著作,而且其翻译杜甫诗歌的方法和风格也是独特的。金启华、金小平《仰止高山别开生面——略论杜甫诗歌对美国诗人王红公的影响》(2008年第1期)一文认为,杜甫在直陈感受、取精用宏等多方面对王红公的诗歌有深刻影响。

而在俄罗斯的情况,李明滨《杜诗在俄罗斯》(1993年第1期)作了介绍。1987年,俄文版艾德林新编《唐诗集》出版,反映了俄罗斯汉学界对杜甫的最新评价。多部俄文版杜诗集出版,至1983年,已有17篇评杜甫的文章发表。谢列布里科夫著《杜甫评传》、别仁著《杜甫传》出版。不过,这篇文章介绍的显然是较旧的材料,时间已过多年,肯定有不少新人新著出现。2006年,中俄举行文

化友好年，杜甫等中国文化名人的著作在俄罗斯引起广泛关注。这些情况有待作新的介绍。

《杜甫研究学刊》对境内外、国内外杜甫研究状况的持续关注，与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是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人的视野，让国人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杜甫在国外的影响会更深更广，学刊“域外论杜”栏目会更加丰富多彩，为中外杜甫研究者提供一个更高更广的学术资料信息库和信息平台。

三十年峥嵘岁月，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见证了中国现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伟大征程，见证了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伟大征程。《杜甫研究学刊》萌生于改革开放的习习春风中，又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共进。三十年来，成为杜甫研究的发动机和助推器，成为杜诗爱好者和

杜诗研究者的精神家园、施展舞台和交流平台。三十年来，杜甫研究不断有新的领域、新的资料、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结论出现，冯至先生三十年前的殷切希望早已实现，相信，再过三十、五十年，《杜甫研究学刊》会更富生机、更有影响力，为杜甫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杜甫批评史》(08JC751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①冯至《祝〈草堂〉创刊并致一点希望》，《草堂》1981年创刊号。
- ②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
-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责任编辑 刘晓凤

(上接 82 页)

- ④许总《建构杜诗学的基础工程》，《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 ⑥⑫蔡锦芳《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增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 ⑦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⑧刘昌诗《芦蒲笔记》，《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 ⑨张忠纲《杜甫诗话六种校注》，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
- ⑩莫砺锋《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北京：中华

书局2005年版。

- ⑪韩成武、周金标《赵次公注在清初的流传及其辑佚——以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为例》，《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8期。
- ⑬朱宝清《杜诗〈九家注〉本引赵次公注有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 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凡例》，清康熙九年(1670)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
- ⑯边连宝《杜律启蒙·凡例》，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初刻本。

责任编辑 彭燕